

艺文述林

文艺学·比较文学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文艺学·比较文学卷

艺文述林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朝华

封面设计：黄建奋

I0-03/20

艺文述林 3

文艺学·比较文学卷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25 插页 2 字数 262,000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5321-1724-3/I·1395 定价：18.00 元

艺文述林

编辑委员会

主编:

齐裕焜 郝铭鉴

编委:

马重奇	王光明	孙绍振
齐裕焜	李万钧	李延瑞
汪文顶	陈庆元	陈朝华
张善文	郝铭鉴	姚春树
高国平	倪宗武	戴永寿

文艺学·比较文学卷

执行编委:

王光明 孙绍振 李万钧

责任编辑:

陈朝华

封面设计:

黄建奋

目 录

大概念·本土·国别文学	南 帆(1)
论中国电影的“后殖民语境”	颜纯钧(21)
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恢复与发展	高少锋(36)
回应当代文艺创作和欣赏潮流	
——谈 90 年代文艺批评的使命	林建煌(48)
香港的学院派文学批评	王光明(62)
外倾与内省	
——西汉文学思想的“结”	郇积意(85)
略论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	林 岗(118)
论小说叙事的“看”和“说”	余岱宗(131)
二三十年代林语堂文化观的历史审视	游小波(153)
《老子》、《庄子》的言语观初探	潘新和(170)
论应用文是行的文	林可夫(179)
网路诗学:21 世纪汉诗展望	
七月派诗歌的矛盾结构	[美] 杜国清(192)
冲突与期待	
——时间文化与新诗“自我”之关系	[韩] 金龙云(204)
太阳与火:现代汉诗意象重构的个案分析	方李珍(217)
	王耀文(238)

中外形异诗探源	王 珂(254)
现代汉诗学术研讨会综述	荒 林(270)
中外文类比较研究刍议	卢康华(280)
疯狂的逻辑	周 宁(297)
中国鉴赏学与海涅的诗歌艺术	
——海涅诗歌与中国古典诗词的鉴赏比照	
.....	马家骏(310)
众里寻他千百度	
——略论王国维戏曲研究历程	安 葵(323)
世界文学教学与比较	温祖荫(336)
东西方三大史诗平行研究	李万钧(357)
一部扎实的比较文学专著	
——评李万钧《中西文学类型比较史》···	孙绍振(381)
编后记	(386)

大概念·本土·国别文学

南 帆

A: 大概念迷信

我曾经在《文化动力·人文学科·解释体系》一文中提到：阐释周围这个社会的时候，我们不该轻易地将赌注押在一两个大概念上面；不该想象找到一两个精彩的大概念包治百病。不言而喻，这是对大概念迷信的反感。纵观若干年的理论演变，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大概念迷信有增无减。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海洋文化、东方文化到新写实、新体验、新状态以及一系列以“后”为前缀的偏正词组——诸如后现代、后新时期、后寓言、后乌托邦等等，种种大概念蜂拥而来，炫目一时，形成了一种奇异的理论景观。许多人毫无节制地滥用大概念，进而热衷于在自己的理论作坊里炼制大概念。可以看出，他们对于种种大概念寄予特殊的期望——仿佛所有的问题都将由一个不同凡响的强大命名得到解决。如果说，依赖大概念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批评家惯用的理论策略，那么，人们就没有理由对这种理论策略的后果置若罔闻。

不难想象，大概念的使用时常给批评家带来一种强烈的命名快感。尼采曾经说过，命名意味着主人的权利；命名是用

声音给事或者物打下烙印,并且通过这种手段将这些事或者物据为己有。大概念通常是对于种种巨型景观——诸如时代、历史或者某些事物的总体特征——给予概括性命名。这无形地暗示了命名者的统治范围和权威的重要程度。这样,大概念也就是创造一个话语的制高点,批评家在大概念的使用之中体验着居高临下的逻辑主宰,大概念将产生一种类似于口号的蛊惑、召唤乃至威慑——这一切将形成大概念的超额内涵。对于许多批评家毋宁说,命名快感和超额内涵体现出的话语权力乃是他们迷恋大概念的首要原因,占据话语舞台中心的意义超过了活跃思想的愿望。

当然,如同人们所知道的那样,许多重要的大概念曾经在理论的演变之中充当着关键词。这些大概念凝聚了历史洞见的分量,它们常常是切开混沌的一个有力概括。由于这样的历史洞见和有力概括,人们可能进入一个新的理论地平线。种种盲区被打开了,一些原先缄而不语的维面在这个新的理论地平线上发出了声音。在这样的大概念支配之下,一系列次级的术语和范畴将围绕着核心组织成一个独特的工作区,开始种种与众不同的阐释。人们可以回忆起,诸如“浪漫主义”、“黑色幽默”或者“魔幻现实主义”都曾经在文学史上产生过这样的功能。考虑到晚近的文化事件,人们还可以提到“人文精神”这个大概念的重现。尽管人们对于“人文精神”的涵义莫衷一是,尽管人们对于这个概念在当下语境之中的基本指向或褒或贬,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文精神”组织了一批重要的话题,并且引起了持续的争辩。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下语境的迫力致使这样的大概念呼之欲出。

相形之下,人们所见到的另一些大概念仅仅是飘荡无根

的理论泡沫。这些大概念通常在某种理论之外的因素——诸如商业宣传、舆论策动、团伙呼应——监护下开始流行。这些大概念时常摆出一副惊人的架势，但是，人们无法在这样的架势背后发现必要的理论后援。这些大概念的爱好者往往不能及时地出示充实的论证。人们可以套用一个熟悉的句式形容为“概念的巨人，论证的矮子”。事实上，这些概念更像是灵机一动的术语创造；人们很难在这些概念的指引之下接触到一个严密的逻辑框架，从而获得一个展开思想的崭新的理论语境。相反，批评家时常在严格界定这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时突然暴露出难堪的左支右绌。换句话说，这些大概念仅供批评家含糊其辞地使用，使用之际体现的气势和貌似博大的风格是批评家先声夺人的有效伎俩。一旦人们识破了这一类伎俩，目光专注地考察这些大概念的确凿涵义，这时，许多大概念就会羞愧地表现出空洞和贫乏。这些大概念无法承受来自理论考察的持续追问，它们将如同朽坏的桥板一样断裂、破碎，坠入意义不明的语言之渊。

的确，回到文学的时候，人们可能不满地发现，某些耸动一时的大概念并未成为文学史描述的奠基石。许多人可能都想到了以“后新时期”为首的一批带“后”的概念族群。“后”的频繁出现究竟多大程度上反映出文学史分期的诉求？在我看来，这个概念族群的出现毋宁说来自“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著名区分的启示。从构词的方式到基本涵义的确认，人们都看到了摹仿的痕迹。描述90年代文学的时候，“后新时期”坦然地挪用了“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一系列论述——诸如知识分子、商业社会、大众文化，如此等等。然而，当“新时期”、“后新时期”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形成了明显的对称

之后，批评家有可能在无意之中偷梁换柱。人们已经发现，90年代文学——亦即批评家称之为“后新时期”文学——之中的某些重要维面将被“后现代主义”理论驱除出视域之外。例如，宣称“启蒙”思想过时的时候，或者，宣称“现代性”终结和“知识分子已死”的时候，这些批评家的理论背景是什么——是“后现代主义”理论还是90年代的中国语境？

与“后”的概念族群不同，另一批以“新”为定语的大概念——“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企图表示批评家对于某些文学事实的直接发现。这种直接发现的标志是，上述概念出自批评家的独立制造。批评家抛开了诸如“后现代主义”这样的概念范本，这意味着他们拥有了自己的理论眼光。然而，这些概念的构词方式同样暗示了另一方面的问题。这些概念一概选择“新”作为定语，这决非偶然。这批概念共同体现了批评家对于“新”的崇拜，这表明了“进化论”视域的强大控制。在这里，“新”已经同时包含了肯定的判断，“新”也就是“好”的同义词。由于“进化论”的视域，许多批评家放弃了同90年代文学的全面对话。他们仅仅局限于“进化论”的线性历史观念，不惜为吻合这种历史观念的作品发出种种廉价的喝彩；“进化论”所难以解释的一系列文学问题重新沦为盲区，弃置不顾。这个时候，批评家很难考虑到，“新”也可能成为一种短缺，或者成为一种限制；在一个更大的意义上，批评家很难超出“进化论”的视域而发现历史的不连续，发现历史的断裂、重复、差异、再现、转型——这些已经远远超出“进化论”的线性历史观念。为了投合“进化论”的判断尺度，“新”几乎成了一个说明一切的标签——批评家甚至没有心情严格地推敲与之搭配的词语。相

对于“新状态”的“旧状态”指谓什么？“体验”能不能经历某一个神秘的时刻而划分出“新”、“旧”之别？这些概念之中，“新写实”内部所包含的“写实主义”显然拥有丰富的内容；可是，为了维护“新写实”的声望，批评家甚至强行扭曲“写实主义”的既定涵义——这将为“新”制造出一个合适的反衬对象。人们可以从一些批评家的论述之中察觉，“新状态”或者“新体验”仅仅是一种内容单薄的勉强表述，90年代的中国文学并没有为这些概念集聚分量足够的内涵。这个意义上，人们再度看到了问题的所在：论证的匮乏。对于许多批评家说来，大概念仅仅是理论的庆典，而不是思想的起点。

当然，人们可以倡导一种更为严密的理论训练，并且尽可能回避粗疏的学术风格导致的种种缺憾。但是，在我看来，大概念迷信同时还是某种文化气氛的产物。大概念的粗制滥造表明，许多批评家对于“中国问题”的复杂程度估计不足。他们没有耐心清理当下文化环境之中的多重关系网络，不想面对或者倾听不同话语系统的“众声喧哗”，并且根据这些话语系统组成的光谱制定相对的理论战略；相反，他们往往企图攫取一个覆盖一切的大概念，撇开无数纷纷扰扰的细节而在某一瞬间一锤定音。使用一个光芒四射的大概念指点江山，纵说历史，这是许多人心目中话语英雄的形象。话语英雄通常不屑于琐细的分析和论证；他们喜欢登高一呼，当众抛出惊人之语，而支持这些大概念的事实、数据、推理和归纳将由他人负责。什么时候开始，批评家放弃了严谨和缜密，放弃了分析实践所体现的智慧和洞察力，转过身来惟妙惟肖地袭用这种社会领袖的风范了？

也许,“中国问题”的确是一个特殊的研究对象——通常意义上的大概念往往无效。中国的众多人口和辽阔版图容纳了丰富的文化层面。这些文化层面隐含了不同的生存模式。文学的任务并不是预订一个大而无当的理论,然后站在一个抽象的高度将所有的个性视为千人一面。文学是一种感性的深入,并且通过每一次的深入——从形式到内容——刻画出一个不可约简的特殊局部。相对于文学的任务,批评是对于文学的真正发现加以阐释,通过阐释再度提出批评自身的发现——这一切并不是一两个空洞无物的大概念所能敷衍的。当然,这并不能阻止批评家使用诸如“后现代主义”这样的概念;这毋宁说意味着,批评家有义务进一步考察“中国问题”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考察“中国问题”的加入将何种程度地改写传统的“后现代主义”理论。

可以看到,尽管一些大概念缺少完整的论证,但是,伪造的理论分量仍将让它们占据一个显赫的话语位置——两者之间的反差有必要引起人们的警觉。由于迷信大概念的气氛和人云亦云的习惯,许多人总是用信赖的眼光迎接大概念的问世,毫无抗拒地承受了大概念所产生的命名暴力。命名暴力不仅是对命名对象的特殊解释,规定命名对象所能呈现的层面,压抑一切与这种命名相抵触的涵义;同时,命名暴力还意味着将命名对象强行纳入这个大概念所控制的理论网络,恭顺地成为这个大概念的有利例证。换言之,虽然某些大概念的产生方式令人生疑,可是,大概念的理论特权却使它们轻易地制造出下一步的理论事实。某种意义上同样可以说,这是符号的逻辑对于现实的改造,现实的未来展开将某种程度地接受符号逻辑的规引。对于文学说来,这已经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我之

所以挑选“后新时期”等一系列概念作为怀疑的对象，很大程度上恰恰因为这些概念的流行——一种缺乏鉴定与批判的流行。

这些大概念的流行将制造出什么样的理论事实？这个时候，仅仅指出“后新时期”是对于“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摹仿已经远远不够。事实上，“后新时期”的提出已经不言自明地承认了如下的理论前提。首先，“后新时期”的使用也就是对于“新时期”这一文学史称呼的无条件认可。这样的认可意味着接受传统的文学史分期方式——以重大的政治事件作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于是，“后新时期”的流行无形地封闭了人们对于文学史结构的种种思考，譬如“二十世纪文学”的提出，譬如当代文学的时间起点，譬如某些文学内部的层面作为分期依据，如此等等。其次，“后新时期”之中“后”的出现亦即无形地认可了“前”、“中”、“后”三段式的切割。这种源于西方文化史的切割尺度能否得到中国语境的合作？例如，这种尺度能否体现“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种价值体系共存的中国现实？不可否认，大概念不仅包含着巨大的肯定，同时也包含着巨大的否定——闷死另一些这种大概念所无法承担的思想可能。如果人们轻易地投身于那些不值得信任的大概念，那么，上述的肯定和否定都将以副作用的形式体现出来。论证匮乏所形成的隐蔽后果将不知不觉地转嫁到这些大概念制造出来的理论事实之中。

我已经表示，我不是在一般的意义上否定大概念的意义——我所否定的仅仅是，批评家不负责任的大概念抛售。因此，我改造了胡适这句名言也仅仅相对这样的批评家而言——“少谈些‘概念’，多研究些问题”。

B: “本土”的歧义

“后殖民主义文化”的理论进入知识背景之后,“本土”再度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概念。“本土”不仅表明了强大的文化根系,表明一种温暖而且熟悉的自然环境;同时,作为一个文化圈的标志,这个概念抗御种种文化杂质,维护文化的纯正血统。对于许多人说来,这个概念是选择与判断的坚硬尺度。他们的种种论断毫不犹豫地坐落在这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上面。事实证明,仅仅将这个概念看作一个理论运作的齿轮远远不够,这个概念背后同时潜藏了巨大的、甚至不无夸张的激情。

我同样对这个概念满怀敬意。许多场合,“本土”将有效地鉴定某些对象的历史渊源,描述冰糖葫芦、京剧、十四行诗和麦当劳之间不同的文化谱系。尽管如此,我仍然有充分的理由提出某种怀疑:“本土”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永不磨损的工具供人任意使用——“本土”并不是如同“太阳”、“氧气”、“植物”这一类术语一样拥有某种恒定的涵义;相反,“本土”的内涵和外延并没有加锁封存,这个概念的界定时常发生变化——这是一个在历史实践之中不断建构的概念。这导致“本土”阐释的歧义——这个概念无法僵硬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成为一个不变的安全系数。在字面上,“本土”不过是特定地域的指谓;然而,既然这个地域内部活跃着一批勇于创造的人们,那么,本土文化就不可能亘古如斯。每当历史的周期性震颤壮观地出现,历史深部涌出的冲动和激情就会使“本土”这个概念的硬壳出现破裂。这不啻于一个提示:人们不能够无视这个概念的历史性位移,心安理得地将“本土”当成一个现成的框

架。当然，人们还将不可避免地使用这个概念作为理论前提，但是，人们不能丧失这样的意识：一定的时间间隔之后，这个概念本身就有必要重新清理和重新探索。

五四运动是一场撕破传统文化的革命。这一场革命使人们意识到，历史必须从传统之中解放出来，而不是亦步亦趋地成为传统的回声。“本土”这个概念同样在这一场革命之中没落了；一批异质的文化强有力地敲开了古老的大门。至少在知识领域，这样的共识已经基本形成：传统不该成为现实的束缚。然而，相对地说，人们对于另一种束缚还没有足够的警觉：历史同样不能够锁定在某些既定的大概念之中，成为这些大概念的副产品。大概念时常是对于种种巨型景观的命名，成为一代文化特征的基本形容。目前，“本土”正是作为一种时髦的大概念恢复了昔日的名誉——这是一个有趣的回旋。

如前所述，不少人业已陷入大概念迷信。他们热衷于崇拜某些显赫一时的概念，相信这些概念能够成为历史的全权代表。这些概念的有力概括同时产生了一种幻象——仿佛这些概念能够提供一蹴而就的思想。只要同这些概念取得联系，后继的范畴与理论体系将源源而来，一个阐释的凯旋指日可待。这更像一种喧闹的理论思辨游戏。这样的游戏背后，大概念迷信不可避免地导致思想活力的衰竭。许多人已经习惯于将所有的分析和论证交付这些概念，不愿意继续深入历史实践。换言之，这些概念实际上成了他们加盖在历史封条上面的图章。他们很少以福柯式的眼光分析这些概念的历史形成，分析支持这些概念的诸种范畴、条件、框架、话语规则，仅仅将这些概念视为特定时期内引导对话的一个主题；他们没有意识到，如果诸种范畴、条件、框架、话语规则产生重大的变化，这些概念

也将瓦解、变形乃至耗尽所有的内涵。可以看到,这种窒息历史的危险明显地体现于“本土”这个概念的遭遇之中。

“本土”是一个典型的历史性概念。这个概念至少包含着纵横两轴的变化参数——时间与空间。唐、宋年间的本土文化与 20 世纪 90 年代的本土文化肯定不同。语言即是一个最为雄辩的例子。所有的人都会承认,现代汉语是本土文化的一个无可非议的基本组成;然而,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比较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外来词语的介入致使汉语处于持续的变易之中。另一方面,参照时间之轴,本土的空间范围同样变动不居。中原文化与蛮夷之地曾经有过的对立从空间的意义上面暗示了“本土”概念的历史变迁。如果没有意识到“本土”背后这两个变化的参数,那么,这个概念就会在某些时刻与历史环境严重脱节。

不言而喻,“本土”与“他者”的差异关系决定了“本土”的确立。很大程度上,本土文化的特征定位乃是在外来文化的参照、权衡和比较之中进行。索绪尔的语言学曾经深刻地揭示了差异关系的意义——一个字的本质不是隐藏在这个字的内部;确认这个字的涵义必须考察它与整个语言系统其他同类因素所构成的差异网络。结构主义乃至解构主义提出的“移心”学说表示了这样的哲学观念:一个对象的本质不是由自身决定,它的基本规定存在于多重差异关系网络深处的某一个暂时的网结点之上。尽管本土文化的确认远比语言学复杂——尽管本土的地理条件、文化传统、种族特征先决地构成了本土文化的固定基础,但是,外来文化的意义正在占据愈来愈大的比重。尤其是在交通以及传播媒介如此发达的今天,在经济贸易结成种种跨国利益共同体的时候,“他者”的规定性以

及“他者”的竞争乃至压迫还将从外部参与“本土”的建构。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者”同样是改写“本土”的涵义另一个重要参数。在我看来，一系列变化参数即是一种抵制——抵制人们将“本土”压入一个固定的理论槽模，定型凝固。

当然，这样的抵制终将指向一种根深蒂固的理论诱惑——阐释一个终极的理论图景。这样的诱惑无形地让人们觉得，“本土”是一种永恒的结构隐藏在无数历史故事的深处，等待一次最后的理论开掘。这样的结构超然地遨游于历史朝代之外，无视时间之流的侵蚀，一成不变。然而，人们已经发现，这样的诱惑无法解释，为什么阐释是无穷无尽的——为什么人们所期待的理论终点迟迟不能出现在地平线上。事实上，阐释毋宁说是一种现实策略；历史环境的改变同时投射到所有既定的文化之上，要求重新说明。因此，重新阐释更像是改变现实策略的一个重要举动。按照福柯的观点也可以说，阐释即是一种实践。每一次成功的阐释即是赋予阐释对象以新的历史生命。

至少在目前，开放“本土”这个概念进行重新阐释，这比设计一个严谨的定义更为重要。中国的历史面临一个巨大的转型，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现象摇撼了人们对于“本土”习以为常的解释。这个时候，本土文化的内涵远比许多人想象的复杂和宽泛。“本土”正在多种现象、多种思想体系、多种利益的紧张对话之中重新浮现；历史深部涌出的活力解除了这个概念的密封性能，模糊了以往的边缘，将这个概念置于混杂状态。历史站到了一个新的空间。什么是“本土”？这又一次成为迫使人们作出应答的问题。当然，通过对话重写“本土”定义，这是一个时期令人欣慰的特征——这是活跃的证明。